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

——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张太原

【提要】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纬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向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关键词】 理论 社会史 新革命史

十余年前,有学者观察到,“学界众皆关注和广泛参与的题目越来越少见”。^①近年仍有学者指出,“牵动整个史学界的大讨论已不多见,更加专业的中小型研讨会则层出不穷。这种状况难免令人感觉史学研究没有‘热点’。”^②长期以来,史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了平静的沉潜的自得其乐或暗自较劲的研究状态,尽管一些期刊开设“讨论与争鸣”之类的栏目、一些学术研讨会的交锋也相当激烈,但范围总是有限,时间上也大多昙花一现,并且往往是“争”而不“鸣”。唯独近年来“新革命史”的提出及讨论,成为中青年学者相对广泛参与及超出了史学界范围的一个“议题”;目前讨论仍在持续,堪称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有学术自身演进的逻辑,又是时代变迁映照史学研究的一个典型表现。^③那么,“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是否反映和预示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趋向?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其内部和外部予以检视,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一、“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

“新革命史”的较早提出者和主要提倡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他曾谈道,在历经长时间的具体研究以后,强化了一直持有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并把它进一步提升和化约为简明的六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项目编号:21STA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③ 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等。”^①加之主要提倡者此前的各种阐释,人们不难发现“新革命史”研究核心理念就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前四个方面都是讲的这一点。所谓“新”,即是将这一视角和方法经过系统化的综合加工以后用在了革命史研究领域。^②所谓“全球史视野”和“新的研究视点”,似乎仅是泛指,与前四个方面并无逻辑关系,用于定义任何史学性质的研究,大概都可以成立。

“新革命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取向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对于域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主要提倡者和一些高明的吸纳者那里,显然已下过相当的功夫消化吸收,进行了可谓创造性的转化,因而运用得比较高明和巧妙,难以看出照搬或套用的痕迹。比如,研究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共革命动员的对象——民众,深入分析民众何以能够被动员起来,其中不仅仅是利益使然,还有很重要的精神作用,特别是情感和情绪的影响。这里,显然是借鉴了裴宜理“以情感的模式”来“重访中国革命”的研究。^③

然而,一些非史学出身或自称追随“新革命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对理论的态度和运用出现了不少问题。他们往往将既存的大理论、大的问题意识视为老套而置之不顾,反而对外来的不成熟的小理论或小的问题意识津津乐道,带着这样的思维取向介入历史研究,自然会造出心中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研究者有一个所处的学术场域问题,类似傅斯年所讲的“对手方”。^④实际上,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大多像一个探照灯照到中国,只能看到灯光照到的那部分,因缺乏化在其中的内心感受,故很难窥一斑而知全豹。并且,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在其本国学术中一般处于边缘的非主流地位,因而中国学者需要特别明了的是,“全球史视野”并不仅仅是一些域外“中国学”研究者的视野。

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本国历史虽然多了一份化在其中的内心感受,但是每个人也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部分历史。对于极丰富的历史面相,所求之“真”实际上也会变得扑朔迷离。历史中本就有各种的“真”,研究者求什么样的“真”以及最终得出什么样的“真”,与研究者的知识、阅历、思想和价值倾向是分不开的。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初涉史学的年轻人“以外来为新”,对“新革命史”之“新”太过自信,以致有可能偏于一途而不自知。

“新革命史”研究的另一种学术取向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尤其注重个案、区域和社会基层的研究,这也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运用于革命史研究最常见的学术路径。有学者明确指出“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⑤只是善于宏大叙述的研究者即便下决心要进入微观研究,可能在更专业的微观研究者看来还不够“微观”。因此,所谓“宏观”“微观”都是相对的,人言言殊,切不可自认标杆。无论从什么样的“微观”到什么样的“宏观”,都应警惕“事小论大”“事轻言重”,特别是不能“以微观历史否定宏大历史,以碎片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⑥笔者曾考察1956—1978年北京居民的食品消费生活,应该属于“吃喝玩乐史”的内容,其中得出一个看法,即这一时期的北京居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一种勉强温饱状态,据此引申

① 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参见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③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7—122页。

④ 罗志田《学术的“对手方”》,《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⑤ 应星《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⑥ 金民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而论: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区可想而知;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实质反映的是根本的、整个系统的问题。^① 尽管引申的这个“大”可能站得住,但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是否能够引出这样的“大”?在这方面,“新革命史”的主要提倡者早就有高度的自觉,认为“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② 也就是说,以“大”看“小”,才能由“小”见“大”,没有背后“大”的把握,“小”就是“小”。然而,目前相当多的“新革命史”研究成果,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由地域到全国、由个别到一般,在以“小”求“大”的取向中,缺乏“大”的了解和把握,往往造成对具体研究的过度阐释,甚至赋予一些个案“不能承受之重”。

毋庸置疑,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将会极大地扩展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空间。然而,目前“新革命史”的研究大多还在非常具体的研究领域。以主要提倡者为例,其研究实践主要集中于“区域与乡村社会”。^③ 据此,主要提倡者提出了“新革命史”的概念、理念和方法,并试图引领未来的革命史研究,恰如他自己所言“有关‘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就是以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史为例进行阐论的,实证研究文章也基本上限于这一领域。”^④ 从其关于“新革命史”的各种阐释中,^⑤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研究趋向和学术追求:由中共在区域和乡村的革命到整个中共革命史,由“中共革命史”到“中国革命史”,由“中国革命史”到“中国历史的规律”。应该说,主要提倡者给自己和随同者指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这方面,似乎还需要更具体、更详尽、更令人信服的论证。“新革命史”研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⑥ 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不难达到,可以说主要提倡者和一些支持者的研究实践已经从许多方面展现了这一“尝试”。正如主要提倡者所言,“新的理念和方法”,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新”,而是把已有的社会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用在了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

至于要完全“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主要提倡者自己也承认,“难度是相当之高甚至很难实现的”。即,“新革命史”的概念已提出,“理论”仍然在“构建”过程之中。不过,主要提倡者又表现出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对“规律”的乐观。“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与弄清中国历史的规律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呢?”据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其实就是与“规律”相似的“最终目标”。^⑦ 怎样的“相辅相成”? 怎样的“加速”? 在主要提倡者那里,可能还处在想象和探索之中。或者说,“新革命史”研究的“取向”已很明确,而“趋向”还不那么明了。但是,“新革命史”研究的支持者很笃定“相比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新革命史’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完整链条”,可以实现“一条通向历史

① 张太原《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③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与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考(1946—1949)——以冀中、北岳、冀南三个地区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李金铮《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等等。

④ 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⑤ 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等等。

⑥ 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⑦ 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①当然,信心和勇气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有时也是必要的。

“新革命史”的提倡者一方面声称借用了“国家—社会”理论,一方面又要构建“符合革命史实际”的“理论”,由此可能会产生两种学术路径:一是用外来或已有的理论“弄清中国历史的规律”,那么这样的“规律”与既有理论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规律;二是力图摆脱各种具体的先见之明,深入研究和揭示“中国历史的规律”,从而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或许更能称得上“理论”。有学者提出,“理论才是历史学的命脉。当然,这个理论应该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历史学的。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②而理论“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之分”,^③研究者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作为革命史研究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学术脉络中的一种实证史学形态”,^④尤其要注意近年“大历史观”的提出。^⑤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依存的理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限制”。^⑥运用理论和理论创新都在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二、“新革命史”概念和内涵的变化

为突出“新革命史”的概念,主要提倡者用了两个与之相对的概念:一是“传统革命史观”;二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这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解释和斟酌。

对于“传统革命史观”,主要提倡者似乎没有进行比较明确的概括,只是指出它有四个方面的弊端:一是将革命时期的理论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混为一谈;二是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三是对中共革命的理解简单化;四是关注的对象主要凸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英雄、反帝反封建等维度,而忽略了革命史的其他更为丰富的面相。^⑦显然,这是主要提倡者对“传统革命史观”条分缕析后得出的一种判断。然而,对于一些初涉史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受其影响的年轻人,在不明了整个“传统革命史观”的情况下,单看这些弊端,很可能产生误读和误解。并且,值得追问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已有很大改变和进展的当下,^⑧这些弊端“盛行”在哪里?怎样限制或阻碍了革命史的研究?^⑨可能还需要更具体更充分的说明,以更好地理解主要提倡者所认可的“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① 王悦之、曾代军《论“新革命史”的兴起》,《苏区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陈启能《“史学理论”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③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④ 吴志军《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⑤ 于沛《新时代呼唤“新史学”》,《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⑥ 欧阳哲生《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前瞻》,《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⑦ 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⑧ 参见田子渝、曾成贵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王士花、周斌、黄道炫《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等等。

⑨ 主要提倡者指出,“在当今传统革命史观仍然盛行的情况下,就已经到了不提‘新革命史’就不足以真正推动革命史研究的地步。”参见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实际上,最初建构“传统革命史观”的学者,大多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推动相关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将,并分居全国史学研究的重镇。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统计过当时具有影响的近代史研究人员,其中列举的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有:黎澍、刘大年、李新、胡华、严中平、蔡尚思、陈锡祺、戴逸、陈旭麓、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章开沅、余绳武、胡滨、夏东元、丁守和、魏宏运、彭明等。“新革命史”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大多与这些学者有师承关系。^① 尽管“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②但是,“新革命史”研究强调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正是从“传统革命史观”内部发展而来的,亦可以说,与其有着合乎逻辑的演进或衍生关系。^③ 从“新革命史”阐释的各种语境来看,主要提倡者所讲“传统革命史观”的四个弊端针对的似乎并不是“史观”层面的,而是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主题、方法或书写而言的,所以,循其本义,可能用“传统革命史研究”相称更为妥切。

对于“‘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主要提倡者是这样来讲的:“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基本上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对乡村史的了解和研究很少,由此缺少纵向的时间视野,缺乏连续性思维,这就使得中共革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④ 这里的“纯牌”不说是令人感到有歧视、嘲讽的意味,起码不那么中性与平和,尽管主要提倡者的讨论态度实际上一直是很理性很平和的。同时,这样一种用语也容易引起进一步追问:什么算“纯牌”?不“纯牌”的又如何?有没有典型的代表作品?主要提倡者似乎仅举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例来说明“传统革命史观”的弊病,然而这是一部集众性的承载着党史教育功能的通史性著作,似乎与其所着意的专题性研究不能相提并论。毋庸赘言,在党史学科领域一直存在学术研究和现实表达两种情况或多种情形。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整个历史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一方面,由于专业研究者言说的对象是专业研究者,而不是非专业研究者。如果以专业向非专业立言,恐怕用力再大也难见其效;另一方面,主要提倡者论证“传统革命史学者”弊病的理路似也容易引起畛域之见,如研究城市史等方面的学者,可能会责怪研究“乡村史”的学者对“城市史”的“了解和研究很少”,甚至更有理由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共革命的“源”和“本”无论怎样追溯都是在城市,“乡村”只是借重之地,并且革命者从未放弃过“城市”的目标,所以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之说。

实际上,提出“新革命史”这样一个概念的意义本身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⑤ 王先明在对“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作了“长程性探究”以后,认为“‘新革命史’中心概念的‘新革命’词语其实早已存在”,因而提醒“如何在学术概念和语义上规避历史熟语”。^⑥ 不过,从主要提倡者在各种语境下使用的“新革命史”来看,“中心概念”似应是“革命史”或“革命史研究”,即“新”的“革命史”、“新”的“革命史研究”之意。专业相近的研究者对一个新概念尚会发生别解,那么其他学者可能更难在同一概念下相向而行。

一位“多学科”背景的“新革命史”研究提倡者,在论述“新革命史”意蕴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史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在‘问题意识’、学科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差异,

① 参见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②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参见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④ 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⑤ 参见陈红民《“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

⑥ 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但最近20年来发生的一个新变化就是这两个领域在不断靠近。在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史原来的边界开始松动的时候,史学已经出现的某些危机症候也渗透进了革命史,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科学以其结构观、整体性、科学方法导向和深层意义解释吸引了一部分史学出身的‘新革命史’研究者。”^①有意思的是,这段话里面“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史”两次并列被使用,并特别用了“领域”“边界”来区分。这样一种用法及论述理路,可能会令史学界的人有些陌生。在作者看来,“新革命史”研究为“社会科学”所吸引,“社会科学”的“结构观、整体性、科学方法”可以救史学界的“危机”。为此,作者躬身力行,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革命史,即成“新革命史”。一般来说,史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没有历史研究作支撑,社会科学就立不起来。“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社会史视角和方法”,虽然都有“社会”两个字,但意旨相去何止天壤!

主要倡者最初提出“新革命史”概念的时候,赋予它的内涵是从“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来“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②在此后多篇相关论作的阐释中,其似乎一再强调的也是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按此,无论怎么具有联想力,都很难涵盖有学者曾梳理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在“中共建党、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③更难涵盖有学者曾概括的20世纪三大革命中“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研究的进展。^④那么,除了社会史、乡村史视角带来的革命史研究进展,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研究进展?如果有,应该叫什么样的革命史研究?尽管主要倡者列举了众多的“新革命史”的代表人物及具体成果,但没有被提及的从其他方面推动革命史研究的人物及成果似乎更多,它们又该如何来称谓?更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作“传统革命史”的研究领域内部,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同样有很大的进展,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主编胡绳,就比较与时俱进。^⑤这也正如崔志海指出的,“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范式有了重大修正和改进”。^⑥怎么看待这方面的“新”?“传统革命史观”内部的演进之“新”,似乎并不在“新革命史”倡者的视野范围。

在近年的论作中,主要倡者明确表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为‘新革命史’”,^⑦充分体现了其对这一概念“再辨析”后的担当,以及揽纳所有革命史研究进展的气度。且不说这样的“新”意义何在?按此冠以任何研究,似都可成立;那么,以这样的“新”又如何建构出一套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若检以“新革命史”研究自身的逻辑,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新革命史”的概念与此前强调的“理念和方法”显然不一致,“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那么,在新的“新革命史”概念下,原来的“新革命史”或许被看作“社会史取向的新革命史”或“革命史取向的新社会史”。

主要倡者之所以对“新革命史”提出新的解释,可能与这一旗号下的众说纷纭有很大关系。有

① 应星《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②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④ 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⑤ 参见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⑥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⑦ 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学者形容,“新革命史”在“研究理念”上,“已经气象万千”。^① 细究来看,在自认或被提倡者看作“新革命史”的研究理念及具体研究中,确有此象:有的强调自上而下解释革命,有的突出自下而上观察革命;^②有的强调传统话语的延续,有的突出外来观念的影响;^③有的重视社会生活史,有的热衷思想文化史;^④有的重视“常识、常情、常理”,有的则认为“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⑤有的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对解释中国革命还有用,有的则认为阶级是为了革命而划分的;^⑥有的强调“精英”的主导性,有的突出“民众”的主体性;^⑦有的强调现实的驱动,有的突出理想的引力;^⑧有的强调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理解革命,有的强调从中国革命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⑨有的强调理念的作用,有的突出利益的驱动;^⑩有的强调民众的主体性和自利性,有的则通过族谱考察家族在苏区革命时期及之后的历史变动,认为不少乡村民众是被动员起来参加革命的;^⑪有的侧重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现象,有的侧重小故事、小人物和日常生活;^⑫有的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有的从特殊性到普遍性;^⑬有的重理论运用,有的重具体升华;^⑭有的认为革命是穷人干的,有的认为革命是富人搞的;^⑮有的认为革命带来了巨变,有的认为革命没有改变什么。^⑯ 同一概念之下,理念的多样,揭示的历史面相的不同,现实寄托的歧异,可能甚于与“传统革命史”的差别。“新革命史”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复杂性,或许正与主要提倡者着意揭示的中共革命本身的“复杂性”相符。无论如何,“新革命史”研究的趋向与原来的取向是不一致的了。

三、多种取向的革命史研究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概念和理念的提出,都可能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质疑,能够经得起质疑才会有生命力。“新革命史”研究的倡导刷新了“革命史”这样一个史学用语和研究领域,引起了包括史学界之外的研究者对“革命史”的注目,在一定范围内、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的进展。

对于“新革命史”的名义或旗号,似可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众多的提倡者与支持者,或可缩小阵地,降低目标,在做某些限定和研究取向的具体标示以后,形成“新革命史”内的若干学派或分支。比

- ① 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 ② 应星《苏区早期中共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③ 应星《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的结合》,《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④ 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 ⑤ 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 ⑥ 孟庆延《从意识形态到地方社会: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再考察》,《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⑦ 李里峰《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 ⑧ 齐小林《“报”在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多重呈现》,《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⑨ 应星《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的结合》,《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⑩ 刘昶《抗日根据地的税收改革》,《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⑪ 饶伟新《赣南苏区革命中的宗族与阶级》,《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⑫ 杨奎松《从整体史的观点着眼》,《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郑莉《日常生活的革命——莆田侨乡的海外移民与跨国生存状态》,《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⑬ 王奇生《受到强烈关注的革命史》,《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⑭ 应星《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 ⑮ 王奇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最适合革命的土壤》,《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 ⑯ 李金铮《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如,目前已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史”等说法。在一些研究人员集中、成绩突出的地方,或许可以成立具有鲜明特色的“革命史研究中心”,作为一个重要平台,势必会更大地推进革命史研究;同时作为一个拳头产品,定会在各种评估中增加相当分量。

当然,致力于和推动革命史研究的研究者,未必都认同“新革命史”的提法,未必都要进入“新革命史”的研究队伍,也未必都要打出一个旗号。但无论如何,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即除了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外,还需要现代化史、外交史、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制度史、学术史、文化史、新闻史等方面的视角和方法,由此形成多取向的革命史研究,齐头并进,可能逐渐会趋向于整体的贯通的革命史研究。同时,研究者应该自警,把历史分为若干专门的领域,只是为了研究的切入和方便,一时代之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历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杂糅和依存的,万不能把进入历史的一种路径当作唯一。对一种研究路向或学术理念极而言之,虽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但有时也容易为其所遮蔽。

历史研究,着眼于“大”才能见“大”,研究中国革命史似还可从思想、政党或政治力量、社会三个方面展开和用力,或者说把中国革命置于这样三个视角下来考察,大概从方向上比较符合整体的革命史研究。就思想来说,既要研究革命思想,又要研究革命所处时代的整个的思想状况及渊源流变;^①就政党来说,既要研究政党的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及革命实践,又要研究所处时代的统治者及其他政治力量的情况;就社会来说,既要研究革命倚重的社会力量,又要研究所处时代的整个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中国革命进行过程中,本来就存在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讨论,^②一个时期革命的展开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关系密不可分,而革命运动的兴起,同样影响着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1933年,一位著名学者指出,“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③甚至有人还认为,“人人心目中,无时不刻不有此问题在”。^④基于此,不研究那时的中共革命,显然无法真正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设计、举措及意蕴。在思想、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中,可能还要穿插和融入传统与现代、外国与本国的研究。这其中又可以分成若干专门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视角,比如政党史,似可从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和革命实践来更具体深入地展开。

如此多取向、多层面、多纬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最终可能会趋向于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基于后见之明的优势及全方位地对历史现场的重建,研究者确实可以树立一个目标:争取比革命者更了解革命,呈现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革命面相,并为揭示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⑤在历史发展的某个节点或某个时期,革命者本来面临着很多选择,为何最终走向了革命?一时代之问题,本来会有很多的解决方式,为何革命主导了社会走向?即,历史本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发展路向,而实际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有把这实际发生的一种放回曾经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中去呈现和审视,才会突显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甚至会有无需标明的现实意义。

① 黄道炫指出,“观念常常决定着历史的走向”,“革命史面对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思维的革命运动,对革命历史的研究,除了必须具有出其外的理论判断力,还要有入其内的理论理解力”。参见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告中国共产党》,《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

④ 社评《如何结束共乱?》,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2日。

⑤ 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不少学者都谈及,改革开放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革命史研究受到冷落,这应该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相对较少。21世纪初,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主办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提问: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中国变成了“国民党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研究共产党的论文,为什么不邀请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来参会?这种情形的造成,自然有学科畛域的因素。中共党史原属于法学门类中一级学科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由此,或多或少地“导致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与研究‘革命史’的学者成为互不交集、互不认同的两大群体”。^①然而,“互不交集”更主要的是“互不认同”,“互不认同”更主要的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认同中共党史研究者。

革命史研究一度处于低谷,固然有“传统革命史观”长期笼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缘故,更重要的可能是学术演进、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近年来,现实环境、时代课题和学术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也有了新的呼唤。除社会史研究者提到的“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已非一百多年前革命艰辛起步时的中国,世界也已非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所向披靡的世界。中国以新的眼光在看世界,世界也在以新的眼光看中国,如何恰当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可能蕴含着许多未曾发现的经验、教训、智慧和启示。当然,这要通过自在的历史来呈现,由此就产生了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新革命史”研究和讨论的兴起,或许正是史学研究者对现时中国众多新因素的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与回应,这似乎预示了未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两个中心”:中国革命史研究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以新的姿态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中心。^②也就是说,革命史研究的多种“取向”,有可能会产生“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③实际上,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历史是怎样的,但更重要的是弄清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即解释历史,深入的历史诠释有一种自在的启示和警示后世的功能。《决议》还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④那么以什么样的“史”为鉴,显然会影响着要开创的“未来”。因此,新时代革命史研究的意义变得更为巨大了。加上“中共党史党建学”已成为一级学科,势必会极大地推动“两个中心”趋向的形成。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人员;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② 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5页。

SUMMARY OF ARTICLES

Orientations and Tre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search: Rethinking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 Zhang Taiyuan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re are mainly two obvious academic orientations: one is to transform foreign theory into local practice; the other is to generalize from the specific, and to draw “big” arguments from “small” content. Ye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rough a series of discussion and “clarification”, the “orient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the actual “trend” eventually diverged. It seems that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history emphasized cannot cover all the aspect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More approaches are perhaps in need to promote stud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nly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a multi-orientated, multi-leveled, 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outlook of Chinese revolution. Only by doing so, we can reveal the aspects that has not been noticed but significant to restore the true face of the revolu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eval World: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Diversity // Hou Shudong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the unity of diversity, and so is it of the medieval world. The various countries, regions and natio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were all special in having their own unique patter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However, we should not understand these “particularities” in the absolute sense, because they were all subjected to the common structure and rules of the medieval world. Modern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t is this fact that drives some scholars to stress the fundamental and even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histories and cultures. As a result, to varying degrees, Medieval Europe has been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Faced with the infinitely rich historical differences of the medieval world, historians ought to think further: do these differences suppor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medieval world consisted of heterogeneous societies, or did these societies share some fundamental characters? Only by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historians develop a conscious view of world history to better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the “hindsight of history”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ain Themes of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 Chen Xiang, Tsukase Susumu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one of its recent trends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We can divide the rise of this scholarly approach into three stages. In studi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ese scholars only took the environment as a background factor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social evolution history, or a side mentioned in the study. In the 1980s, 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cholars in Japan began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us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a group of scholars embraced and adop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